

引 论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世纪更迭、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从什么角度、以什么问题为主线总结即将逝去的 20 世纪的基本经验；同样，又以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和行动准则，去迎接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求索、思考的大问题。

1992 年，邓小平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①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本书将要展开的探索、研究，这是一段带有总纲性质的重要论述；或者说，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解和展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第 382 页。

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是很朴实的道理，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科学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逐步搞懂搞通了这一根本道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是一种反映着历史必然性的形象说法。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需要有各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近代中国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的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 70 年中，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的几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卓绝、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失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粉碎了中国人企图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它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陈腐世界观和各式各样的理论武器已经落伍，已经不可能提供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道路、对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什么力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认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471 页。

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其失败是必然的。证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要想找到一条使中华民族复兴的革命道路,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找到一种崭新的理论武器,找到一种真正革命、科学的世界观。

第二,十月革命不仅为先进的中国人送来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成功范例,对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一次“相结合”意义上的深刻教育和伟大启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真理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的一个时期,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虽然苦苦求索、屡屡失败,但始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那时,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已经传入中国,但均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介绍者一般都不想在中国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甚至采取的是一种歪曲和敌视的态度。正是列宁亲自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桥梁乃至榜样的作用。“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幸福的思想武器,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完备、最革命的世界观。如同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根本在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在 19 世纪中叶产生并迅速席卷欧洲，根本也在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要以已有的思想材料、文明成果为前提，但根子却深深地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马克思主义不应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应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①还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早在 1843 年马克思也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著名论述，反复阐述的也是一个十分朴实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第 71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742 - 7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第 416 页。

实际相结合，在相结合中不断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对待这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唯一正确态度。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从这一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重新确立和创造性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认识。

二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块著名的匾额，上面都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一个写于湖南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个写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延安中央党校。不可否认，它们有着极不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涵；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实事求是”已经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古老命题。从表述形式上看，它最早出自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一语。本意

是指刘德所倡导的一种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即首先要辨明古代文物、典籍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非，借助的主要是一种训诂、考证、校勘之功，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无华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从这一起源看，“实事求是”最初基本是一个为古代封建文人使用的考据学命题。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实事求是”命题的这一学派属性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直至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盛时，仍是如此，其代表是考据学大师阮元。阮元一生历任高官，著述勤奋，是“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①在学术研究中，阮元直接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家开创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即努力寻求古代的本来涵义而不作任何无根据臆断的训诂学方法，主张士人读书当先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先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而训诂又须从声音文字开始。乾嘉学者中除阮元之外，惠栋、戴震、钱大昕等都是“实事求是”学风和方法的倡导者、实行者。

但是，若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或思想内涵着眼，从中国哲学和文化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而不衰的自我更新机制入手，考察实事求是的历史渊源，我们将会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我们能有较为开阔和宽广的视野，深入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内部，作一点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正是这一理论线索。不错，原典儒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他们所开创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478 页。

的关心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注重运用和讲求实效的经世传统，就是“实事求是”思想最早的历史积淀。其中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破心术之公患”（破除主观片面性）的思想和韩非对“道”和“理”的解释，均有思想源头的意义。宋明理学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派别，但它也以颠倒的方式为“实事求是”命题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理论铺垫。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朱熹对“理”之必然性、规律性涵义的揭示，对“即物穷理”命题的阐释以及他所提出的“实理”概念等等。明清实学是中国哲学经世传统的典型表现，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接近近现代文化、最具新质特点的形态，是实事求是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意义上的直接来源。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和地方学派，综合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追求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即“致思”、“致用”相统一的传统，是产生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的文化土壤。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曾国藩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两大命题的联系，而且以他既会“传教”又会“办事”极善治军打仗的实践，对毛泽东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可见，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和基本精神。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引进、吸收和消化了作为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孕育产生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包括同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在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相反，他们是带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始了自觉接受、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因此，不仅仅停留

在“实事求是”一语的词语考证上，而是从基本精神或思想实质着眼，考察实事求是的历史渊源，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种疏理，也可以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内在必然性。

那么，湖南岳麓书院和延安中央党校两块同样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匾额，其中又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理解从第一块匾额到第二块匾额这种革命性的改造和升华呢？其一，二者有着根本不同的阶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不再是古代封建文人的口号，更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如曾国藩等实现“重振朝纲”的主张。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之“是”即规律的理解，根本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指一种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古代文人那种“是非”、“真假”、“虚实”层面上的理解与主要指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和“理”意义上的理解，均有根本的不同。其三，经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性改造后的实事求是虽然仍有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之涵义，但这时的“学”既指某一学科、专业的学问，更是指共产党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它的科学态度。因此，这时的实事求是不仅是学风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它所关系的决不仅仅是学问之大小、深浅，而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命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其四，作为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本质在于创新，在于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蕴含有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所独具的这种革命的批判的本质，更是任何一个古代文人不可能理解和做

到的。

三

在当代中国，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学以致用、收到实效，首先要从根本上提高关于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定性、自觉性的认识。

历史告诉我们，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但是，怎样正确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更加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这一伟大过程的开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日益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在异常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反复解读、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历史，因而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形成、确立和发展的历史。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由十月革命所阐释、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学术的、文化的思潮，而是革命的武器、行动的指南；从一开始就没有、也不可能躲进书斋去从容不迫地消化、吸收而是极其现实、迅速地运用并要求有一种能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的实践效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和实践本性的反映。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相结合的伟大斗争中，逐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才能逐步克服和纠正诸如理论准

备不足、经常不能准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等弱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生死挑战既来自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来自各种各样外部的矛盾和困难，又经常来自自己内部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他国经验和自己某些成功的经验神圣化的本本主义，决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虽历经坎坷和磨难，仍能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在中国共产党近 80 年相结合的伟大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这一意义上说，相结合的历史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确立、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也是这一思想路线随着实践的发展被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的历史。回顾和总结这一历史，既可以从根本上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规律，也有助于人们科学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理解邓小平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发展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上、特别是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上，走上了一条转危为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致胜之路；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也开始了一个认真反思、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经验教训，并开始哲学上概括和升华、逐步

形成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上、特别是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健康发展之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在理论上认真反思、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以“文化大革命”为集中表现的“左”倾错误，并从指导思想上新确立和创造性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时期。

1998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2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重新举起实事求是伟大旗帜的一代哲人——邓小平充满深深的怀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刚刚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来的党和人民都在痛定思痛，努力探寻导致那场恶梦的原因。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满足于将一切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的浅薄之论，要求从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根本的拨乱反正。然而，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20年前，一场分别以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为旗帜的讨论和斗争，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同时，它也决定了那场讨论和斗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学理之争，而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讨论和斗争。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站在那场讨论和斗争最前列的是邓小平。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科学态度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旗帜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亲自支持和指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一个人讲的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决不能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根本方针。正是这次讲话，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正是以这次讲话为主题的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完成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完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具有时代特点和气息的新概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每一个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只要读到邓小平的这一精辟论断，心中都会情不自禁地忆起当年那令人激奋、解放的感觉。可以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打破现代迷信的束缚，从思想和灵魂深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获得一次真正的解放，是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根本价值所在。也许还要经过许多年，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43页。

至还要以许多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坎坷为代价，我们才能真正懂得这一点。

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一个过程；在实践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仍然是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的两次飞跃，它们均以两次重大的失败和挫折为前导，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包含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是一个不断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与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过程。不断推进和深化这一过程，既表现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日益深刻和正确的把握，又表现为对指导实践的理论之本质、即规律性的日益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并把二者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最终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只有从相结合的高度，认真分析这一辩证过程，才能真正提高坚持和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定性、自觉性。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际是一个过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我们之所以有时犯违反或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其理论症结经常是在认识和把握实际时出现了失误。具体有二：其一，从实际出发，并不是从孤立和片面的情况出发，而要从全面的情况和事物的总体出发。列宁说：我们“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

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①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再考虑到事物都有无限多的属性、特性、方面，人们都要认识和把握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实事求是的内在本质性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做到这一点，以防止认识错误和思想僵化。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和矛盾，我们只能在不断解决这一困难和矛盾的过程中前进。其二，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自己的运动”中，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际，必须按照事物本身固有的发展变化考察和认识事物。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永恒的、绝对的，人对这一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的认识和把握，是一种“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②这也是一个矛盾，是一种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不懂得这一矛盾，也会造成认识的僵化、简单化、直线化和绝对化。

从相结合的角度看，搞清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国情，是共产党人首先应当认识和把握的最大实际。因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全面考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是主要倾向；正是这一倾向，是我们在实践中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 第 41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 第 20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633 页。

屡犯‘左’的错误,事业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确认识和掌握规律更是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正确认识和掌握规律的历史。在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中,规律即实事求是之“是”有三层逐步递进的涵义:一是客观事物内部或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即规律性;二是主体在规律性认识基础上制定的能直接指导实践或操作的方针、政策、办法等;三是在这些方针、政策、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升华出的某种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在“是”的三层涵义逐步递进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换,一是由规律性认识向方针、政策、办法的转换;二是由方针、政策、办法向理论、学说的转换。没有这两次转换,实事求是不能成为现实的运行过程;有了这两次转换,又都潜伏着滑向主观主义的危险。列宁指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①这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总是由思维造成的困难。^②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学会克服这一困难,无疑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用辩证法考察人类的认识运动,最根本的价值之一就是揭示认识的辩证过程,阐明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是普遍规律,说到底它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特别是规律性的认识,必须受各种条件制约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些制约条件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前者指人的实践范围、阶级立场、观点、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 421 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列宁:《哲学笔记》第 285 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方法、知识水平以及生理素质等等；后者指社会实践的水平、认识工具的水平、客观事物矛盾和本质发展、暴露的程度等等。正是这些制约条件，决定了任何人、即使象毛泽东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造主体的认识能力，否则，也会犯错误；决定了我们党总是在革命和建设遭受了巨大的失败和挫折之后，才开始变得比较地聪明和成熟起来。总之，对于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错误，或者虽承认错误但找不到错误的根源，不善于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 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 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人类认识辩证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的也是这一真理。由于客观发展着的中国具体实际的极端特殊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一部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要善于不断从失败和挫折中学会怎样才能正确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 只有当人们面临失败和挫折时 才会冷静地总结、反思 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客观规律性象一种有意和人作对的异己的力量横在面前，逼得你不得不去研究、反思，不得不再深入思考一下如何处理主客观的相互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失败和挫折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不断端正思想路线的一个必经环节，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32页。

五

早在 1957 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① 邓小平在 40 多年前的这一论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坚持和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固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但首先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责任。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根本的实践原则，“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 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②

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不是枝节之论，它的根本意义、价值首先在于对有关基本国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如阶级估量、力量对比、主要矛盾、中心工作等，并据此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成功地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实事求是所要防止和反对的首先不是经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主观主义（当然这决不能理解为经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主观主义不在防止和反对之列），而是上述一系列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如果坚持和做到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事求是，那么，经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主观主义也往往比较容易得到克服和解决。首先作这一限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7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258 页。